

青春话题



图片来源:www.quanjing.com

在每个考研人的身影背后,通往研究生的路途却有着各种不同,在这些不同中,有坚持,有等待,有收获,有满足。

“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”

肖文(化名)本科毕业后,在北京生活了4年,生活还算稳定。但不久前,他向工作单位请假,回了一趟山东老家。

“今年考研,我选择了在老家的考点,所以得回去确认考点。”肖文说,今年北京考研的人数特别多,有些考点限制了人数,需要现场确认

又到考研时。随着2013年研究生报名日的到来,一年一度的考研备战也渐进高潮。

认时出示工作证明,他不想让单位知道自己考研,所以干脆回家报考。

这已经是肖文第5次踏入考研的考点了。他的考研目标很简单,本科学习文学的他立志要考复旦大学的新闻学研究生。在他考研的几年间,这个志向一直没有变过。“最初是因为理想吧,但是现在也有了现实的考虑。”

目前肖文供职于一家网站,工作其实挺不错的。如果说有现实的考虑,那会是什么呢?

“其实很多和我一样坚定考研的人应该都有这样的考虑。”他说,就业仅仅是刚毕业的学生最初的考虑,在解决了就业之后,我就必须考虑事业的发展,而这时需要更多的投入。当然,此时的‘投入’便包括了这几年

的考研经历。

与很多人想象的不同,被称为“考研专业户”的肖文并不是一个异常执拗、天天死扎在题目中的书呆子。平时,他有着自己的工作,还有一个相恋多年的女友,即使是对于考研本身,他也在坚持的背后,有着一份对于成败的豁达。

在去年的研究生考试中,肖文与最终录取的分数线只差3分,可以说是失之交臂。对此,肖文的理解是,你想得到比别人好的东西,除去运气的因素以外,你就必须付出的比别人更多。“其实人都是这样的,承受挫折是成熟的一部分。”

考研路上的苦乐日子

■本报记者 陈彬

如今的肖文还在积极准备着明年的考试,至于今年如果失败,还会不会继续,他说自己还没想好。记者问他:“回想这几年考研经历,有什么感觉?”肖文稍想了一下:“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吧。”

“能睡一周就幸福死了”

有像肖文一样坚持的,也有像李昕或一样“折腾”的。

李昕或是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大四学生,如今的她每天到教室上课,到图书馆看书,还准备考驾照,日子过得很自在。但如果把时间往前拨2个月,这样的日子就完全是一种奢望了。

9月18日,对李昕或来说有着特别的意义。因为那一天,她终于拿到了学校的保研推荐信,这意味着从那天起,她可以申请外校的保研资格了;但同时,这段时间也意味着她必须要加速度,因为那天距离浙江大学的保研申请截止日期只剩下一周的时间。

李昕或梦寐以求的专业是浙大的新闻与传播学,这也是她很早就定下的目标。好在这个“目标”没有让她失望,就在浙大公布外校保送研究生面试名单的最后一天,李昕或收到了通过资格审查的短信。

十一黄金周后的第一天,李昕或和全国各校的学生来到浙大参加面试。“对很多申请外校保送的学生来说,都不会只投一所学校,所以当不同学校发来面试通知时,‘面试’就变成一场‘赶考’。”李昕或说。

为保险起见,李昕或向3所学校投了资料,并都收到了面试通知。在结束浙大面试后的第二天,就有一场上海某高校的面试在等着她。但因为时间太紧张,李昕或决定放弃那次机会。“能不能上浙大还没底,又要放弃一次机会。那种心情……能理解吧?”

与之前风风火火的准备相比,最后的面试反倒有些波澜不惊。李昕或说,面试的感觉不是很好,走出面试考场时,他甚至产生了一种再回去“补充两句”的冲动……

如今,面试结果早已知晓,李昕或也如愿以偿。她说自己曾不止一次地想过,等这一切结束了,自己一定要大睡上整整一周时间,那就幸福

死了。

“后来这个愿望实现了吗?”记者问。李昕或没有回答,取而代之的是一阵爽朗的笑声。

“学宗教人少,问题不大吧?”

同李昕或目前“淡定”的生活类似,周鲁鲁现在的生活也很平静。但是,李昕或的“淡定”源自于保研结果的水落石出,而周鲁鲁的“平静”则源自于对自己实力的胸有成竹。

周鲁鲁现在的身份是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宗教学专业研究生。在这个身份之前,他曾有过若干个身份,比如西南大学园艺园林学院园艺专业本科生,以及该院园林专业本科生。不久的将来,他的身份很有可能要变为香港某高校文化研究与宗教专业博士生。

对于若干次专业跨越,周鲁鲁表现得同样很“淡定”。“其实也没什么,只是高考时并不清楚自己喜欢的专业,于是在本科阶段调了一次。大学四年虽然学工科,但却对文史越来越感兴趣,于是便在考研时又调了一次。这次申请博士只是专业名称有点变化,研究内容还是贯通的。”

很多有考研经历的学生都知道,“跨校跨专业”的难度相当大,更何况横跨了文理两大学科门类,其难度更是可想而知。可问及周鲁鲁的考研经验时,他的回答很简单——心态好。

“我的本科专业的就业率一直不错,所以自己没有太大的就业压力,考研对我来说更多的是兴趣使然,不存在后顾之忱。”他说。

当然,没压力不等于没动力,更何况这份动力还是来自于兴趣本身。于是,周鲁鲁同样也会一天看十个小时书,也会在等待结果时惴惴不安。

如今,已经研三的他正在申请香港高校的Ph.D项目,虽然申请手续还要在明年1月份办理,但他自己却是成竹在胸。“应该问题不大。”

“为什么对自己这么有信心呢?”记者问。

“之前我们和香港高校就有很多交流,彼此都很了解,而且我所研究的内容本来就很小众,竞争也不是很激烈,一个学校学经管的人都能赶上全国学宗教的人,想想应该问题不大吧。”周鲁鲁笑着说。

周振宇:哲学给了我新生的力量

■本报通讯员 吴奕 张明平

来,初三时,个性张扬的他由于过于标新立异,遭到了全班学生的抵触,“当时我一蹶不振,成绩下滑得厉害,还去医院接受过心理治疗”。

初三暑假,他第一次接触到尼采、康德、叔本华,“原来世界上有这么有力量的思想!”惊奇之余他一遍遍地翻看《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》、《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》等哲学著作。聪明的他思想上变得成熟起来。

半年创作七万余字

大学是周振宇真正开始学习的地方。仅用了大一下学期,他就创作了七万余字书稿,加上高中时创作的一万余字,准备集结出版。“写完时在网上传了20多家出版社,结果没有一个回音。”

周振宇的想法是简单的,第一次遇到了现实阻碍,他预想等工作后自己出书;然而,他又非常幸运,就在此时,学校外国语学院为其买单——拨出30000元工作经费支持图书出版。

“我写书不是为了留名,而想留下思想释放的印记。”周振宇说,电影《盗梦空间》提到思想是最富有黏着性的东西,“写作就是思想凝结的过程,不是为了产生某种思想,而是为了摆脱思

想,从母体脱离出来成为独立的个体”。周振宇已在着手第二本书《尼采和庄子》的写作。

只为了证明自己

“不是为了谋生,而是为了证明自己。”2011年11月,还是大二学生的周振宇经过选拔、培训进入镇江新东方,主讲SAT课程;今年暑假,他被选拔到宁波新东方,主讲托福、六级、考研词汇,给一大帮年龄比他大的人上课。“学英语原来还有这样一种方法,就像一场头脑风暴。”上过课的学生如是说。现在,周振宇自创的词根记忆法已经小有名气。

日常生活中,“大神”周振宇和普通大学生一样,喜欢打游戏、看电影、健身、玩高科技产品。他坦言,自己在生活上不是特别节俭,但在学习和人生目标上绝对努力。

刚上大学时,周振宇有三个目标:学4门外语,出书,找个女朋友。如今这三个目标都已经达成,他又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:申请全额奖学金去美国读研。周振宇知道,父母亲无法负担他出国深造的费用,作为一个“言必行,行必果”的行动派,这一次,他还是要靠自己的努力去一步步实现。

学子情怀

我喜欢的你是寂静的

■吴奕

我喜欢的你是寂静的,不吵不闹,有点小味道。

行走在北京,故宫、天安门、颐和园等热门的景点,人们像回溯产子的鱼一样,挤到了一处。你刚想凭古迹发发幽思,一句刺耳的“游客朋友看这里”瞬间就打消了所有的情怀。

一日清晨走访北京的雍和宫、国子监。旁边是雍和宫,许多善男信女在此上香祈福,只是不肯往前多走几步,于是便造就了国子监的寂静无声。已是秋天,没有落叶的苍凉感,只有苍松弯曲地生长,在历史纵深中长成一种永恒的姿态。小小的你就这样立着,望着,看历史怎样的高大。计时的日晷还在行走,你坐在历史的静物面前,用心描绘。

偶有鸟雀在周边落下,跳跃,觅食。

现实与历史的奇幻交错,动与静谱写的黑白音韵。此刻,历史不再是张牙舞爪般地演绎,而是一种寂静的姿态。

若是还怀念古,南京的总统府也是个好去处。你避开各种人群,退到总统府的一弯绿水旁,找一个石椅坐下,风吹过,柳枝摇曳,池水荡起微澜,只是很快就平息了。而这样的平静背后经历了怎样的血雨腥风。你闭上眼,太平天国的揭竿而起,孙中山先生的国家新梦。仿佛你一瞬间阅尽历史,也在一瞬间消散。

也许,寂静是另一种模样,它有声音,却激不起内心的波澜,反而让红尘中的我们重回宁静。

犹记得,在泉州,泉南佛国众多寺院。承天寺,闹市中的安静处。不是初一初五的上香日,只有三三五五零散的造访者。第二次来访,壁上的佛教故事早已熟稔,佛像也拜过一遍了。闲来无事,坐在台阶上,不到正午,阳光在绿叶的阻挡下,一束束地倾下来,不知哪一束恰是点化你的。佛音渐起,你仿佛能看见佛的面容,如此安详!

走过那么多不同的地方,或喧嚣,或安宁。回首才恍然发现,我喜欢的恰是你的寂静。

(作者系福州大学学生)

国际视点

大学要拒做“灵活”的反义词

■本报记者 温才妃

气候变化、金融危机、恐怖主义……人类随时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可能,但是绝大多数人的认识总是跑在变化之后。

哥伦比亚大学校长李·博林格近日在参加“北京论坛”时表示,大学应该在全球化进程中发挥更重大的作用,它有义务向新一代人清晰地描述全球化的社会,而要想履行这一职责,大学必须重新反思教学与科研的课题。

全球化保证学术活力

“有人说大学反应迟钝,这一点我不得不承认。”李·博林格说,“从本质上讲,大学是‘灵活’的反义词。我们经常会感觉力不从心,只能在时代的潮流后面拼命地追赶。”

事实上,哥伦比亚大学可谓最具全球视野的一所大学。2009年,哥大在北京设立东亚中心;今年9月,哥大在里约热内卢设立了第八个哥伦比亚全球中心,目前其全球中心网络已覆盖五个大洲。

“哥大致力于了解全球化进程中的新兴要

素。”李·博林格表示,这些全球中心能够在地区间发挥灵活的枢纽作用,把各个领域的学者、学生、官员、企业家和创新人士聚集在一起。

今年夏天,哥大组建了两个学者考察团,赴海外探讨如何以创新型方式应对发展问题。其中一个团队来到北京、上海了解相关政策。许多人回国后叹服道,所见所闻足以改变自己的一生。而这项活动正是得益于全球中心的组织安排。

“大学应该改变体制,才能保证学术活力,从而不断追求使命。”李·博林格深信,全球中心网络会将新思想传播回母校,使得师生的思维方式发生重大改变。“我们必须发生改变,否则就无法用全球化的教育给自己、他人以启迪。”

公众可从大学的作为中受益

大学生们总爱说,“我认为”、“我感觉”。

李·博林格认为,这样远远不够。“大学的使命就是要培养学生本能的反应,不要把问题过度简单化,不要对各种课题浅尝辄止。”在大学,学生必须说出原因,解释想法,提出前提,为自

己的假设辩护,并证明结论的真实性。

大学固然可以约束学生的行为,可大学外的世界却另有规则。在李·博林格看来,大学需要改变,公众也需要改变,而且公众可以从大学的作为里取得很多收益。

他指出,当今的社会气氛缺乏宽容,不相信甚至反对专业知识,尤其在公共场合下,人们采取“少说话,少犯错”的态度非常糟糕。

“如果我们想要对社会有所影响,必须具备三元素:理性的引导、学术研究的基础,更为重要的是社会要吸收大学中培育出来的钻研与创新的精神。”李·博林格说。

在他看来,人类的民主不仅仅是一个妥协的过程,还要承认在对话的牵制中会得出更理想的决策。为此,他建议,所有的学科都应该联合起来,尤其是理科和文科,帮助解决现实中的问题。“不管其他机构怎样,大学一定要承担起这一责任。无论是生活在传统的社会,还是新兴的社会,我们一定要有公开的辩论讨论和理性的思维方式。因为,人类的进步有赖于思维的质量以及据此作出的决策。”

随着孔子学院数量上的不断增加,目前各地孔子学院呈现出“僧多粥少”的局面,靠总部“输血”显然不是长久之计。此外,作为一个跨文化交流的桥梁,孔子学院还有一些更加深层次的问题需要思考。

从0到398所,八年间孔子学院如雨春笋,在国际上蓬勃发展,被许多外国政要评价为“迄今为止中国最好最妙的一个出口产品”。

然而,在获得赞誉的同时,专家们也开始全面审视孔子学院八年来所经历的一切。

首当其冲的定位之思

最初创办孔子学院的目的很单纯。国家汉办主任、孔子学院总部总干事许琳表示,就是为了满足无法来华的人们就近学习汉语的需要。国际上,著名的德国歌德学院、西班牙塞万提斯学院等,都是孔子学院创办之初学习的对象。

若干年过去,人们频频从孔子学院官网上看到,孔子学院的活动不仅限于语言教学,还包括文化交流及推广的活动。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孔子学院甚至将名剧《牡丹亭》搬上舞台,还与当地议员举办对话访谈活动。

对于这些不断扩充范围的活动,许琳说:“这是因为孔子学院所在的学校、社区和国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,不但要求孔子学院教授汉语,还要介绍中国文化、开展中外教育和文化交流,使之成为中外文化交流与合作的综合平台。”

事实上,歌德学院、塞万提斯学院等也都在以各种方式推广本国文化。北京歌德学院经常举办展览和德国电影观赏活动。北京塞万提斯学院会在节日举办Party,不时举办名家讲座。

然而,在更多人看来,歌德学院拥有61年的历史,塞万提斯学院也已成立21年。与之相比,孔子学院还太年轻,其经验积累、运作方式不比前两者成熟。

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葛剑雄认为,现阶段应坚持推广汉语的定位,不要轻易改变。“演出性质的文化推广活动应该交给中国文化中心来做,汉办应该把孔子学院定位在语言教学上。”

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刘乐宁对此表示赞同,因为“汉语是汉学赖以存在的根本”。

发展中的改革之路

随着对中国了解的加深,海外孔子学院对师资的要求越来越高,单纯语言教学的老师已不能满足学生的需求。

“孔子学院呼唤汉学家来讲课。”许琳说,在师资方面中国派出的人符合这一“高标准”的很少。

记者了解到,目前,孔子学院的教师基本是由孔子学院总部派出,以经过国家汉办统一培训的志愿者为主,他们的核心任务是承担语言教学工作。

不仅是师资,作为一个国际教育文化合作项目,跨文化管理也是孔子学院在日常管理中不可回避的一个问题。

法国留尼汪孔子学院法方院长王晶表示,在具体操作理念上,孔子学院中外院长长的分歧并不仅仅是人与人之间的个性差异,还有源于国家和文化的差异。“譬如在运作法国的孔子学院时,更应该考虑参照法国大学的运作方式。”

最重要的问题是经费。目前,孔子学院的项目和经费必须经过总部的评审,那么,这一机制或者评审机构的意志会不会束缚甚至阻碍孔子学院的发展?刘乐宁的美国同事们对此非常关心,“他们很担心总部在这一环节中影响学者们的课题选择”。

随着孔子学院数量上的不断增加,目前各地孔子学院呈现出“僧多粥少”的局面,靠总部“输血”显然不是长久之计。爱尔兰都柏林大学孔子学院外方院长王黎明认为,孔子学院自身可以创收以实现可持续发展。然而,《孔子学院章程》中却明确提出,孔子学院是“非营利性机构”。行与不行,尚且是一个未知数。

深层次的文化担忧

在许多人看来,孔子学院今后的发展肯定不会是一个模式,“和而不同,百花齐放”才是应有的姿态。而在这个探索过程当中,各个国家和地区孔子学院总会找到适合自己的模式。

作为一个跨文化交流的桥梁,孔子学院还有一些更加深层次的问题需要思考。

著名汉学家、美国芝加哥大学副教授艾恺认为,目前孔子学院确实为中国文化拥抱世界提供了不可替代的助力,但是孔子学院的火热与中国经济飞速发展是分不开的。换言之,更多的人对中国文化感兴趣是因为中国作为政治经济实体的强大,单纯的文化意义上的吸引力可能并不大,“孔子学院在海外如何实现文化上的持续吸引力,这个问题值得思考”。

文化教育不同于一般实用知识的传播,这一特殊性使得孔子学院必须直面文化根底的问题。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讲师张路指出,需要讨论的问题是:针对文化的教育该如何完成?中国文化最根本的东西是什么?“当下,中国人自己都存在着对于中华文化的文化认同问题,怎么可能做好对外的传播和交流。只有我们自己先把这些问题回答好了,孔子学院才能办好,才能承担起人们对它寄予的厚望。”

孔子学院八年发展之思

■本报见习记者 韩珉